



# 不灭的火焰

——苏联国家文学奖获奖中篇小说集

不屈的人们

团的儿子

方尖碑

旅伴

(下)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整整两年里，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到离城不很远的那所乡村小学去一趟。多次想去，但每次都往后拖。冬天，想拖到寒潮稍退或暴风雪停息以后；春天，又想等干燥暖和一些；到了夏天，路也干了，天也暖和了，又一心忙着去那拥挤、炎热、人口稠密的南方度个把月的假期。另外，我也曾想过：还是等工作和各种家务闲一些再去。正像生活里常有的那样，我一拖再拖，以致来不及去做客，只有去参加葬礼了。

关于葬礼这件事我知道得也很晚。我出外办事回来，在街上遇到一个熟悉的老同事，我们随便讲了几句话，开了几句玩笑，要分手了，他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又站住了。

“听说了吗？米克拉谢维奇死了，就是谢尔佐村的那位教师。”

“怎么——死了？”

“可不，就这么死了。前天死的。好像今天安葬。”

这个同志说完就走了。米克拉谢维奇的死，他大概无所谓，可我心慌意乱地站在那里望着大街。有那么一刹那，我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忘了自己所有急需办的事。一种还没有意识到的内疚猛地一下把我击懵了，像把我钉在这块柏油马路上。当然我也知道，这位年轻乡村教师的早死，我是毫无过错的，而且他既不是我的亲戚，甚至也不是我亲近的朋友。但我还是感到一阵心痛：一来出于对他的惋惜，二来这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一个无法弥补的过失：有一件事我过去没有做，现在是永远也无法去做了！无疑，我要抓住最后这一次求得自我安慰的机会，所以当机立断，现在马上就到谢尔佐去。

从我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刹那起，就感到时间过得飞快，无法按常规去计算，确切点说，已经不知道时间是怎样过去的。我全力以赴，急忙行动起来，虽说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回到家，家里一个人都不在，连一张告诉他们我外出的便条都没有写，就向

汽车站跑去。我想起机关里的工作，想打个电话，但自动电话机仿佛故意跟我作对似的。它正常无误地吞着硬币，却像中了邪似的成了哑巴。我跑去找别的自动电话机；只是在新建的“美味食品商店”的大楼旁才找到，但已经有一队人耐心地排在那里。我等了好几分钟，听完了玻璃被打碎的蓝色电话亭里那些冗长琐碎的通话，还和一个原先被我当成姑娘的小伙子吵了一架——他穿着喇叭裤，亚麻色的络络鬃发一直拖到绒布短上衣的领子上。等到我终于打通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却错过了去谢尔佐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今天看来不会再有去这个方向的车了。我想在停车场拦住出租汽车，但白白浪费了半个来小时。开过来的每一辆车，都有一群比我动作迅速、主要是比我脸皮厚的人冲上去。最后，我只好费力地走到城外的公路上，采用了在这种情况下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截车。果然，从城里开来的第七辆或许是第十辆满载一卷卷油毡纸的汽车在路边停住了，让我和一个小伙子上了车，他穿着胶底运动鞋，挎包里鼓鼓囊囊地装满城里的大面包。

坐上车，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只是有时候觉得汽车走得太慢，而且我发觉自己在心里骂司机；尽管冷静一点想，我们这趟车开得很正常，和别的车没有两样。铺着沥青的公路平坦又几乎笔直，汽车只是在上下慢坡时轻轻上下颠几下。时近黄昏，晴朗的仲秋季节，远方宁静清爽，一片片幼林浅黄稀疏，空旷的田野辽阔无际。远一点，靠树林附近，放牧着集体农庄的牛群——几百头一岁的牛犊，一样的年龄和个头，一样的棕红毛色。在公路另一侧的广阔田野里，集体农庄一台不知疲倦的拖拉机在嘟嘟地秋耕。几辆满载亚麻秆的汽车向我们迎面驶来。路旁的布基洛维奇村庄，房前花园里的晚季天竺牡丹红花似火，艳丽夺目，菜园里犁开的垄沟边，倒伏着干枯的茎叶，农妇们正在那里翻捡土豆。大自然充满宁静的秋光。庄稼已经成熟收割，大部分农活已经做完，只剩下粮食的加工和冬藏了。在这个时候，人类恬静的喜悦流露在古往今来、代代繁忙、节奏和谐的农活之中。明年春天再见吧，多辛多劳的田野！

但是大自然的柔情美意却怎么也没能给我安慰，而只是使我感到压抑和恼怒。我来晚了，确实晚了，我感到痛苦，悔恨自己懒惰成性和麻木不仁。以前的种种理由此刻全都变得没有根据，其实我又何曾有过什么理由？要是这样懒散迟钝下去，就很容易虚掷年华，了此一生，在这罪恶的人间没有做出任何一件或可使你生命具有意义的事来。如果为了虚无飘渺贪得无厌的幸福，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而将重要得多的东西弃之不顾，那就让这种无聊的生活见鬼去吧！因为这会把你的生活阉割得毫无意义。你的生活只是你自己才认为是自主的，与别人生活隔绝的，按你纯个人的生活轨道安排的。事实上，如果人的生命还充满着某种有意义的东西（这并非今天的发现），那么这首先就是人类的合乎理性的善良和对别人的关怀——关怀那些与你亲近甚至和你疏远，但是需要你关怀的人们。

也许米克拉谢维奇比别人更懂得这个道理。

其实，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文化水平也不是出奇的高，也没有受过足以使他出类拔萃的高等教育。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也许既不高于也不低于成千上万的其他城乡教师。不错，我听说过，他在战争期间有过一段悲惨的遭遇，甚至是死里逃生。还听说他身患重病。任何人第一次见了，就能发现，他重病缠身。但我从未听见他抱怨过，或者让人知道他是多么的痛苦。记得我们在一次教师代表会休息时相识的情景。当时他正在市文化宫喧哗的前厅靠窗站着和一个人谈话。他骨瘦如柴，两肩高耸，背上的两个肩胛骨从西装上衣里鼓出来，脖子细长，我从后面望去，他显得特别柔弱，几乎像个孩子。突然他把那张苍老疲倦、皱纹密布的脸转向我，我的印象立即改变，感到这是个受够了生活折磨的小老头。其实呢，我准确地知道，当时他才三十四岁。

“听说过您了，有件疑难事早就想求您。”米克拉谢维奇当时说话的声音有点暗哑。

他吸着烟，把烟灰弹在手指捏着的空火柴盒里，我还记得，我

看到他那皱皱巴巴的焦黄的手指在神经质地颤抖，不禁吓了一跳。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迅速地把视线移到他的脸上：他的脸显得疲惫不堪，但惊人地安详和开朗。

“报刊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他开玩笑地、又有所指地引用了这句话。从他脸上网一样的皱纹里露出一丝善意的，带着痛苦的哀愁的笑容。

我知道他在格罗德诺地区游击战争史里查找什么，他还在少年时就参加过游击队的活动。一九四二年，他的几个好同学被德国人杀害了，米克拉谢维奇张罗着给他们在谢尔佐立了一个不大的碑。原来他还有件什么事指望我帮忙。那还用说，我是愿意帮忙的。我答应上这儿来谈一谈，如果真是疑难的话，尽可能把它搞清楚。在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解决各种疑难复杂问题的兴趣。

可现在，我来晚了。

公路沿着小树林边上缓缓地拐了一个大弯，松树的华盖高耸在公路上空。拐过弯，谢尔佐终于出现在眼前。从前这里是地主庄园，几十年的老榆树和老椴树，枝繁叶茂，绿荫如盖。一幢独门独户的老式楼房——现在的学校，隐匿其中。汽车不慌不忙地驶近通往庄园的路口。我就要到了！随着汽车的驶近，我心潮翻滚，重又沉浸在悲哀和痛苦之中。顿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为什么来这里参加这令人伤心的葬礼？本应该在以前来呵！现在谁还用得着我呢？而且这里又有什么我所需要的东西呢？但是现在这样考虑问题看来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汽车开始放慢了速度。我叫了一声同路的小伙子，要他敲敲驾驶室，从他安静的神情看得出，他还要坐车往前走。我踩着一卷卷粗糙的油毡纸，走到车帮旁，准备往路边跳。

我就这样到了！汽车生气似地从排气管里喷出一股气，又继续往前开动了。我在公路边走了不多远，也顺便活动活动麻木的双腿。我在公共汽车的窗口不止一次看到过的这个熟悉的叉路口，以其抑郁的殡葬气氛迎接我。横跨沟渠的小桥边竖着一根柱子，挂一块公共汽车站牌，柱子后面可以看到熟悉的方尖碑，一块黑色

牌子上刻着五个少年的名字。距公路百步远的地方，挨着大道有一条古老狭窄的林荫小道通往学校，两旁粗壮的榆树东倒西歪。在林荫道那一头的校园里停着一辆“嘎斯”车，还有一辆黑色的、看来是区委的“伏尔加”轿车，在等着什么人，而那里却见不到一个人。我想，“人们现在也许上别处去了。”但是我连公墓的所在地也弄不大清楚，要是真还有什么必要去，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就这样我犹犹豫豫地走进了树冠重叠浓荫蔽日的林荫道。大约五年前我就来过这里。那时这古老的地主大院，还有这林荫小道，并不显得这样死气沉沉，因为那时正是课间休息，校园里到处是孩子们的欢笑声。而现在，四周鸦雀无声，被不祥的殡葬气氛所笼罩，甚至连老榆树稀稀落落的黄叶也不再发出簌簌的声响，蛰伏在傍晚的静谧之中。沿着这平坦的砾石小道，很快就来到了校园——面前耸立着一座宫殿，有上下两层，可见当年也曾富丽堂皇过一个时期，不过现在已经破旧衰败了，正面的宫墙都有了道道裂缝。这老式宫殿的外廊有雕花栏杆，大门两侧立着白色圆柱，还有那威尼斯式的高大窗户。我需要打听一下米克拉谢维奇在什么地方安葬，但是又没有人可以问。我不知去哪里好，茫然若失地在汽车旁边徘徊了一阵，甚至都想进学校了，突然另外一辆满是灰尘的“嘎斯”车从林荫道里飞驰而出，差点没把我撞上。汽车猛地刹住，从帆布车篷里钻出一个身穿皱皱巴巴的绿色锦纶雨衣的人。这人我认识，是州管理局调来的畜牧专家，听说，现在在局里一个什么地方工作。我们大概有五年没见而了，尽管只有点头之交，但他在此时此刻出现，我打心眼儿感到高兴。

“好！朋友。”畜牧专家向我打招呼，他洋洋自得、容光焕发的脸是那样兴致勃勃，仿佛我们不是来这里参加葬礼，而是来参加婚礼的。“你也来了，啊？”

“嗯！”我有所克制地答了一声。

他立刻接过我这种克制的语调，把声音压低了说：“他们在教师楼那里。喂，来帮个忙吧。”

他抓住一个角，从汽车里拖出一箱“莫斯科”牌白酒，一排

排的酒瓶在那里发亮，看来他是去村供销社或城里买酒回来。我接住了箱子的另一头，两个人抬着绕过学校，穿过花园里的树丛，沿小道朝附近那所住有教师的厢房走去。

“他怎么就死了呢？”我问道，对于这个人的早死我还是觉得突然。

“就这么死了呗！什么事不都这样突如其来！人活着活着，一下子就死了。”

“他死前至少生过一点病什么的？”

“病！他生了一辈子病了，但这人是真干。结果干过头了。既然有这样的机会，那就去喝上一通吧！”

开始显得稀疏的丁香丛中露出一簇簇鲜嫩多汁的山楂，红艳艳的。花丛后面是一所泥灰脱落的破旧厢房，听见里面有许多人在低声谈话。据此可以推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仪式已经结束，丧宴正在进行。厢房几个矮窗户敞开着，在向两侧拉开的窗帘中间，露出一个身穿白色尼龙衬衫的男人脊背，并排是高盘在一个女人头上的亚麻色浓发。两个没有刮脸的男子，身穿工作服，站在门廊旁边抽烟。他们三言两语地聊着天，然后默默地接过我们手里的箱子，抬进了屋。我们顺着狭窄的走廊，跟在他们后面。

一间不大的房子，能搬的东西现在全都搬出去了。几张桌子拼放在一起，上面摆着剩下的一点酒菜。席上的二十来个人已经在谈天和吸烟了，缕缕烟雾徐徐飘向窗外。从这种显然是不紧凑的场面可以看出，筵席已经进行了不是一小时了。我也知道，我的迟到还不如不到，很容易受到非议，但既然来了，当然不能拿起帽子就走。

“请坐，这里有地方。”一个头裹黑色三角巾的上年纪的妇女语气悲痛地请我入座，她并没有问我是谁和做什么来了。大概像我这样来晚了的情况，在这里是很平常的。

我顺从地在高桌子旁边显得矮了一点的凳子上坐下来，尽量不引起这些人对我的注意。但身边一个人已经向我转过脸来——一张浮肿苍老的脸庞全是汗。

“来晚了？”他说得很随便，“有什么办法呢？再也见不到我们的帕夫利克了，他已经不在了，喝一杯吧，同志！”

他把一杯显然是谁喝剩的伏特加塞到我手里，杯上还留着别人的指印；他自己从桌上拿起另外一个杯子。

“来，老弟，愿他安息！”

“好吧，愿他永远安息！”

我们干了杯，我用别人的叉子从盘里叉了一小片黄瓜，我这位邻座用不听使唤的手指从揉皱的“冠军”牌香烟盒里夹出了可能是最后一支烟。这时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妇女又摆上几瓶“莫斯科”牌白酒，几个男子把酒分斟到杯子里。

“静一静！同志们，请静一静！有人要讲话了。”这话声音很大，带着醉意，从贵宾席方向传来，盖过了嘈杂的人声。

“克先佐夫，区教育局局长。”我的邻座喷了一口浓烟，附在我的耳边大声说，“他能说什么？他知道什么？”

在桌子的那一头，只见一个年轻人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显得有点呆板固执的脸上露出领导人那种惯有的自负的表情。他举起一杯伏特加。

“关于我们亲爱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大家都已经谈过了。他是一个好党员，先进教师，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总的来说……一句话，他不应该死。”

“要不是战争，他就不会死，”一个女人很快地插了一句，想必是坐在克先佐夫旁边的那个身穿淡咖啡色高级短上衣的女教师。

教育局长讷讷地说不出话来，像是被这个插话弄糊涂了。他整了整胸前的领带，完全看得出，他作这方面的讲话有困难，不习惯，他搜索枯肠，但看来根本找不出适合这种场合的词句。

“对，要不是战争，”这个演说家终于表示了同意。“要不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的、给我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战争。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战争创伤已经医治，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已经恢复，苏联人民在各个经济部门，还有文化、科学、教育部门都取得了卓



越的成就。尤其是在……”

“这和成就有什么相干！”突然有人在我耳边大吼了一声，桌上的一个空瓶子往上一跳，随后就在盘子中间滚开了。“这和成就有什么相干？我们是来送葬的！”

教育局长不怀好意地把话打住。席上的人都开始紧张地、几乎是惊恐地瞧着我的邻座。他那涨红的脸冒着虚汗，一双已经开始衰老的眼睛明显地充满着愤慨，一只静脉曲张的大拳头咄咄逼人地压在桌布上。教育局长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然后平静地、带有几分尊严地说话，好像在训斥一个犯了纪律的小学生：

“特卡丘克同志，放规矩点！”

“安静，安静！您怎么了？”坐在我邻座旁边的那个女人侧着身子对他关心地说。

但是特卡丘克看来不愿意静静地坐着，他慢慢地从桌旁站起来，挺了挺那笨重的开始衰老的身子。

“你自己倒应该放规矩点！你干吗在这里扯什么成就？为什么你不提莫洛兹？”

眼看就要吵起架来，我感到挨着他坐不那么得劲。好在我是局外人，而且并不认为自己有权过问这件事——安慰谁或者支持谁，但是应该说，教育局长还是表现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克制。

“莫洛兹和这毫不相干！”局长沉着而坚定地制止我邻座的进攻，“我们又不是为莫洛兹举行葬礼。”

“很相干！”特卡丘克几乎喊了起来，“有米克拉谢维奇这样的人，这要感谢莫洛兹！”

“米克拉谢维奇嘛，那又当别论了。”局长不再争辩了，他端起半杯酒，“干杯！同志们，为了悼念米克拉谢维奇！愿他的一生成为我们的榜样。”

席间开始了碰杯后常见的那种活跃空气。大家都干了杯，只有脸色阴沉的特卡丘克示威似地将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

“对不起，我来不及拿他当榜样了，如果你们想知道，他过去

是拿我做榜样的。”他气势汹汹地说，说时没有对着谁，因此谁也没有答理他。

局长尽量不再理会这个好抬杠的人，其他人也只顾吃东西。这时特卡丘克转过身来对我说：

“你谈谈莫洛兹，让他们知道知道……”

“哪个莫洛兹？”我莫名其妙。

“怎么？你也不知道莫洛兹？竟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坐在谢尔佐又吃又喝，竟没有一个人想起莫洛兹！他在这里应该是人人知道的……你们干吗这样看着我？”当他发现有谁用责备的眼光看他时，已经是大动肝火了。“我说的我清楚。莫洛兹才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他过去就是米克拉谢维奇的榜样。”

席间安静了一会儿。眼前发生的这场风波，我不清楚，但其他人想必是十分清楚的。在片刻慌乱之后，还是那个教育局长打着官腔，用一种可亲可敬的坚定语气说话了：

“应当想想再说，特卡丘克同志！”

“我是想了才说的！”

“这就对了。”

“别说了！季莫菲·季托维奇。您别说了，”他身旁那个年轻女人一个劲儿温和地劝他。“最好还是吃点香肠吧！这是家里做的，城里恐怕没有这样的。看您一点东西也不吃……”

显然，特卡丘克并不想吃，而是气得一个劲儿咬着牙，满布皱纹的而颊隆起了一条条肌肉。过了一阵，他抓起一杯没喝完的伏特加，一饮而尽。那双失神发红的眼睛在眉毛下面痛苦地闭了一会儿。

席间变得安静了，大家默默地吃东西，有几个人在吸烟。我转向右边一个穿绿毛衣的小伙子——看样子，他不是教师就是农庄的专家，我往特卡丘克那边扬扬头，问他：

“您不知道他是谁吗？”

“季莫菲·季托维奇，从前这里的教师。”

“现在呢？”

“现在退休了，在城里住。”

我又坐正了身子，仔细地端详着我身边这位怒气冲冲的老人。不，在城里我好像没见过他。也许是从某地搬去不久吧。看样子他已经对这里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像个陌生人一样一言不发，忧郁的目光死盯着印有方格的台布花边上。

“从城里来吗？”他突然问道，大概已经发现我在注意他。

“从城里来。”

“搭什么车来的？”

“搭顺路的车。”

“你自己没有车？”

“暂时还没有。”

“你们喝吧！悼念吧！我走了。”

“您坐什么车走？”

“什么都行。不是头一回了。”

“那我跟您一块走，”我突然决定。待在这里看来没啥意思了。

我至今也难以说清楚为啥要跟他走。好不容易到了谢尔佐这个庄园和学校，却为啥又愿意这么快地离开？当然首先是因为我来晚了。我为之而来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人世，而席间的这些人又引不起我多大兴趣。就连这个新伙伴，当时根本不使我感兴趣，他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不如说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喝得半醉而又爱吹毛求疵的退休老人。从他把自己说得比故去的米克拉谢维奇高明的那些话，流露出老年人常有的矜持，听起来总叫人不太愉快。即使他说的都是实话。

然而我还是带着一种模糊的轻松感离开席位，走出门来。特卡丘克个子大，身体结实，显得有点笨重，穿一双皮鞋和一件很旧的灰色上衣，胸前挂着两枚奖章。他像是喝多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在葬礼中心绪不佳，又在一场我还没有弄清原因的争吵中受了点刺激。但看他的那个样儿，显然是真生气了。现在他踏着小道，走在我前面，故意露出不愿跟任何人交往的神情。

我们这样默默地走过了庄园，进了林荫道。还没走到公路，一辆卡车开过去了，也许还是一辆往城里开的空车。本可以喊一声，跑几步，但我这位同伴并不加快脚步，我自己对此也不十分着急。挂着汽车站牌的柱子下面一个人也没有。公路两头空荡荡的，路面上白天看去发出耀眼的亮光。

我们走到路口就停下来。特卡丘克看了看公路的两头，然后就在他站的地方坐下来，把双脚放在路边的沟渠里，沟渠不深，没有水。他不愿意同我交谈——这是很清楚的。为了不惹他烦恼，我走开了，眼睛一直盯着公路。从树林拐弯的地方出现一辆“莫斯科人”牌私用汽车，车顶鼓鼓囊囊堆着行李包。一股汽油味迎面扑来。汽车开过去了。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那个方向却空空荡荡的。夕阳低挂在公路上空，躲藏在薄薄的乌云后面；落日的斜晖使人眼花缭乱。总盯着那个方向看来并没有多大意思——那里没开来汽车。我对公路渐渐失去兴趣，沿着沟渠边上的小路走到了纪念碑前。

这是一座低矮的水泥方尖碑，周围是板条做的栅栏，是本地的一些工匠砌的，普普通通，没有过多的装饰。即使不说它寒酸，也显得过分简陋。现在甚至在乡下建纪念碑，也比这讲究得多。方尖碑尽管没有巧妙的装饰，倒也看不出荒芜的痕迹。我记得，经常有人来细心照管，一块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墓地上铺着新沙子，小花坛的四角用砖砌成，里面盛开着一一些叫不出名的晚季花卉，色彩缤纷，鲜艳夺目。这座方尖碑，比一个人只高一点点，碑的颜色，十几年里我记得换过好几次：或者节前被用石灰刷得洁白如雪；或者被涂上军装一样的绿色；有一次，我途经此地，在公路上看见它银光闪闪，像喷气式飞机的翅膀。而现在，方尖碑成了灰色；在所有的颜色中，这种颜色对它的外观也许是最相称不过的了。

方尖碑的外貌虽几经变换，但唯独那块刻着五个学生姓名的黑色的金属小牌依然如故。他们在战争年代立下的功勋在我们这个地方是闻名的。我以往每次都没去细看，不看也知道。但这一

次，我奇怪地发现上面有新的姓名——莫洛兹·阿·伊，是用白色的油漆写在其他姓名的上方，写得不十分好。

公路上，从城里方向又开来一辆汽车。这是辆自卸车，沿着空荡的公路飞驰而过，扬起的灰尘迫使我的同伴从不太适于休息的那个地方站起来。他走到柏油公路上，担心地望了望。

“鬼等得起！走吧。有车来了再搭！”

我只好同意了。况且黄昏临近，天气变得更好了。既暖和，又没风，榆树上没有一片叶儿飘动，空荡的公路像一条闪光的长带诱你在上面漫步。我跳过沟渠，两人以久未有过的舒畅心情，踏着平坦的柏油路而大步走去，只是偶尔回头看一看来。

“您早就了解米克拉谢维奇？”只是为了打破已经开始的使人难受的长时间沉默，我问了一句。

“了解，太了解了！看着他长大的。”

“可我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我承认说，“只见过几次面。听说他是个不错的教师，书教得好。”

“教书！别人教的也不比他差。可他是个真正的人。孩子们成群地跟着他跑。”

“现在这样的事真太少了。”

“太少了，以前可是常有的事。他小时候也是这样跟着莫洛兹的。”

“顺便问问，这个莫洛兹是谁？真的，我一点也没有听说过他。”

“莫洛兹也是个教师，我们以前一块儿在这里开始教书。我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来这儿。他十月份开办这所学校。总共四个年级。”

“他牺牲了？”

“是的，牺牲了。”特卡丘克一而说，一面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走着。

他西装上衣的扣子全都解开，领带结儿胡乱地歪进衣领的一角。一片痛苦的阴影从他那刮得不太干净的大脸庞掠过。

“莫洛兹曾经是我们俩的心病——我和米克拉谢维奇。我不值得一提，我退却了；他不这样，他到底胜利了，达到了目的。可

惜他自己没有熬过来。”

现在我好像开始明白了点什么，猜到了点什么。是战争时候发生的一件什么事。但由于特卡丘克说话不连贯，而且很简单，所以许多事情还是没弄清楚。看来需要多问问，可是我又不愿讨人厌，只是为了不使谈话中断，我才插进几句无关的话。

“事情就是这样，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要求人们付出代价，有时代价还很高。”

“是呀，代价太高了……主要是他继承得很好……现在，有许多人在议论继承父辈的传统……莫洛兹当然不是他父亲，但他继承了莫洛兹。简直太妙了！有不少回，我看着看着，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像莫洛兹·阿列斯·伊万诺维奇的兄弟。样样都像——性格、善良、原则性都像。而现在……虽说不可能……但他身上总有什么会留下来的。不可能不留下！这样的东西是不会失传的。一定会发芽，一年、五年、十年之后，总有什么会破土而出的。你看着吧！”

“这是可能的。”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这些人的劳动不可能白费，尤其是因为他们死得不平常。老弟，死是有意义的，可以说有伟大的意义。死——这是绝对的证明，无法辩驳的论据。你可记得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吧，去吧，无可指责地去牺牲，你不会白白地死去，事业将会永存，假如为这一事业有鲜血在汨汨地流动。’<sup>①</sup>说得真好！咱们这儿流了多少鲜血呵！鲜血不可能白流。莫洛兹也已经极其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了，你还不知道哩……”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承认，“米克拉谢维奇本来也打算告诉我的……”

“我知道。这事他对我讲过。他那时谁都找，也想找你。只是

---

<sup>①</sup> 引自《诗人与公民》，见《涅克拉索夫诗选》第109—1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没来得及。”

这些话使我感到内疚。难怪我内心感到：我在这里毕竟犯了一个自己并不愿意犯的错误。不过谁知道呢！谁能料到，这一切竟会导致这样的结局！

“你是报社的编辑吧？”特卡丘克瞟了我一眼。“我知道你写小品文，还有别的……你是在为真理战斗啊！所以他当时就想找你参加这件事——为莫洛兹辩护。不！莫洛兹没有罪，你别害怕。他哪里是什么德国人的走狗！不是这么回事情……”

特卡丘克停了一下，我说：“有意思，要是我早知道……”

“现在一切都办妥了，该找的辩护人也找到了。如今也可以讲了，就是写书也可以。真应该写书呀。米克拉谢维奇赢得了真理。只是他自己……你有烟没有？”他拍着身上的空衣兜问道。

我给了他一支烟。我们俩点燃了烟，不约而同地往旁边一躲，让一辆闪着镍光的“伏尔加”牌黑色轿车从身旁飞驰而过。大概“伏尔加”是往城里去的，但此时此刻，我们谁也无心去拦截。我等着特卡丘克继续讲故事，只见他茫然若失地目送着这辆轿车，全神贯注地陷入了沉思。

“这车本来应当把我们俩捎上，是吧？哎，去他的！他开他的车，我们慢慢走。你多大年纪了？你说，四十岁？还是年轻有为啊！以后日子还长着哩。虽然已过去一段了，但还剩下好大一段，当然要看你身体是不是健康。我的身体还不能说坏，有时还能喝上一盅，但是已经不如以前了。老弟，以前我在这儿很少等过公共汽车，再早的时候干脆就没有公共汽车。你要进城去，拿根棍子就走。三个半小时走二十公里就到了城里。现在大概要费劲得多了，我也好久没走长路了。腿还不要紧，主要是神经不行了。我不能看电影，遇到叫人伤心、特别是描写战争的影片，一看到我们那个时代的痛苦，虽说是全都过去很久了，并且逐渐淡忘了，可是嗓子眼里就像堵住了什么东西。还有那音乐，当然不是任何音乐，不是什么爵士乐，而是当时流行的歌曲。只要一听到，简直就像锯子在锯我的神经。”

“应该治疗一下，现在治疗神经颇有办法。”

“不，我的神经是治不好的，六十二岁的人了，你还能怎么样！生活把我折腾苦了，真像把我的神经乱拽乱扯一样。学者们讲，神经细胞是不能恢复的……是啊！我也有过年轻时代，没有结婚，身体健康，就像条牛。一九三九年大合并之后，教育人民委员部派我来西部地区筹建学校。建校，建集体农庄，忙得团团转，自己还在一些学校里干过。战后就在这个谢尔佐，我闹闹哄哄地干了七年……”

“光阴如流水啊。”

“不，光阴似火箭。从前总想先干它一两年，然后到莫斯科去，想上师大学习。因为战前我只读完两年制的师资班。可是，事与愿违。战争开始了，结果什么师大也没有上成，一辈子被缠在这儿。以前是区党委不肯放，学校啦，家啦。现在呢，你可以随便往哪儿滚了，可哪儿也没有心思去了。看来，我也得和莫洛兹一起埋在这块土地里，只是晚一点罢了。”

他停住话头。我抽完一支烟，也没有说话。我们已经过了小树林，公路进入山沟，两旁耸立着沙土坡，长着松树。暮色一下子明显地变浓了，连罗汉松的顶盖也昏暗得看不清楚。只有那无云的高空还在闪烁着夕阳告别前的余晖。

“今天几号？是十四号吧？我正是在这个时刻第一次来到谢尔佐的。这一条条山村小道现在已经习惯了。可当时却显得那样新鲜、有趣。办学校的这座庄园并不像现在这样荒凉，那时候房子看管得很好，油漆得很鲜艳，像玩具一样。九月份波兰地主加布鲁斯逃之夭夭，扔下了所有的东西，据说是投奔罗马尼亚去的。于是莫洛兹办起了学校。校门前耸立着两棵枝叉伸展得很远的大树，树叶呈银白色。这不是一般的树，而是美洲红杉之类的参天古木。这种树在一些旧时的庄园里至今还可以找到一些，但也都快完了。那时候这种树有的是，每个波兰地主家里都有不少。

“头一年，我在区人民教育局当局长。学校几乎都是新办的，都不大，有的办在保卫团的岗楼里，有的干脆办在乡下的农舍里。



教材、物品都缺，教员也十分缺乏。和莫洛兹一起在这个谢尔佐工作的是波德盖斯卡娅，我们都叫她雅佳小姐，其实她是个岁数相当大的中年妇女。这个贵小姐是个老处女，加布鲁斯在时就住在我们去的那间厢房里。她几乎不懂俄语，白俄罗斯语也懂得不多。但其他方面，那就了不得！受的教育是最高等的。

“一天傍晚。我坐在区人民教育局办公桌旁，埋头翻阅公文、报告、计划、报表，我到全区里跑了一趟，一个星期没有回局，积压了一大堆，真够受！听见有人用指头轻轻敲门，是过了一阵才听见的。进来的就是那个雅佳小姐，她那么瘦小，脖子上却围着一条很讲究的狐皮，头上戴着一顶阔气的洋女帽。‘请原谅，局长先生，我向先生请教一个教育问题。’‘那好，请坐，说吧！’

“她在安乐椅的边上坐下来，整理整理她那顶漂亮的帽子，就炒豆般地讲开了，差不多全用波兰话。我费了好大劲才听懂。她的一举一动真像文雅的小姐，但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一张狡猾的小脸布满了皱纹。她为什么来这儿呢？原来，她跟谢尔佐学校的上级，同事莫洛兹有矛盾。原来，这个莫洛兹不维护纪律，跟学生讲平等，教学不严，不执行人民委员部的教学大纲。而最主要的是他不让学生去天主教堂，说这是老奶奶们干的。

“谈到天主教堂嘛，我自然不会太为这个担心。我想，莫洛兹要是这样劝学生，那就做对了。至于有失教师身份，不讲纪律，无视人民委员部的教学大纲——这才是我所担忧的。但这个莫洛兹到底是谁？我毫无印象，谢尔佐我还一次没有去过。当时我想，好吧，一有机会，我就去一趟，看看他那里搞的什么名堂。

“但是过了好一阵我才找到这样的机会。两个星期以后，我到底抽出了身，向房东借了一辆自行车（这地方叫脚踏车），就沿着这条公路骑去。公路当然不是现在这个样，铺的鹅卵石。在上面不管坐大车还是骑脚踏车，反正都会把你的肠子颠出来。但我还是去了。我使劲地蹬着车子，一个小时就到了这条榆树遮蔽下的林荫小道。我原来想去听课，但是没赶上，已经下课了。我老远就看见院子里尽是孩子，心想他们在玩什么游戏，但没有，没在